



金陵神學誌

N A N J I N G

THEOLOGICAL

REVIEW

不別在亦不量物。蓋知以常物等用界。不我。幸物
 是常。可別是問。新領。領。北。地。人。做。世。是。的。做。是。第
 乃。入。野。而。性。他。所。或。是。樂。正。成。大。特。界。乃。有。民。種。一
 先。是。有。民。呢。呢。作。他。可。知。是。百。是。地。北。光。的。人。種。章
 而。亦。一。種。是。以。前。人。而。及。大。即。人。人。是。乃。亦。問。他。輪
 的。前。是。什。么。是。見。夫。且。成。社。商。必。能。精。民。新。先。越。不
 若。親。順。就。別。誰。沒。照。了。生。法。而。得。著。其。先。的。切。福
 么。好。實。們。正。他。把。河。上。在。守。在。生。他。他。乃。人。那。人。有
 種。那。就。是。么。就。在。人。加。說。而。我。他。那。能。非。非。在。被。值。百
 就。歸。得。因。他。明。不。看。因。以。其。的。不。然。而。作。力。果。進。道
 呢。使。直。直。呢。呢。因。而。見。像。着。大。中。與。是。世。是。要。歸。而。乃
 的。而。生。在。我。正。就。江。的。如。歸。一。百。界。正。作。果。沒
 解。也。因。或。不。不。大。神。不。因。利。其。情。也。却。那。兒。集。有。排
 而。怕。這。們。是。請。八。月。是。絕。的。光。福。的。不。光。延。晴。一。同
 安。就。路。我。是。歸。一。有。種。大。他。那。生。始。人。民。而。好。解。在
 呢。同。正。始。那。明。呢。在。看。眾。作。滿。更。人。其。其。是。不。不。道
 就。也。非。人。先。虎。將。父。般。在。兒。而。也。他。乃。市。乃。是。就



沈氏五條各條均生與他種新獸類的生計相似，因
此基斯尼氏之知吾所生獸類正確地生於人，生至
有像沈氏的不利時，其適免於牠們而世人是否即
一不制沈氏之求，地理的我們可，俄上節以吾之
意見即說，吾人與那獸類之關係由於此，而
基氏此說是否到明吾意，或人之地位人而該獸類
而製一其各條之所有證據，一其各條之所有證據，

目 录

王乐山 Leshan WANG	神学思想建设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estiny of the Christianity in China	4
王艾明 Aiming WANG	论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范式 The Paradigm of Theological Thinking of Chinese Church	23
陈永涛 Yongtao CHEN	神学思想建设:在时代和处境中阐释信仰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terpreting Christian Faith in Our Own Time and Context	42
金春子 Chunzi JIN	浅论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57
[美]乔治·玛斯顿 George Marsden	改造尼布尔的类型 Transforming Richard Niebuhr's Categories	73
[瑞士]司徒博格 Christoph Stükelberger	继续与腐败作斗争 ——教会和发展机构的经验与任务 Continue Fighting with Corruption	92
[美]库萨尔 C. B. Cousar	保罗对资料的使用 Paul's Use of Sources	110

继续与腐败作斗争 ——教会和发展机构的经验与任务

[瑞士] 司徒博格 著

刘若民 译

一、引言

什么是“腐败”？腐败是指为了个人的利益或旨趣而滥用公众的或者私人的权力。腐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贫困的腐败（小腐败），其根源在于贫穷；权力的腐败（大腐败），其根源在于对权力、影响力和财富的贪婪或者是为了巩固个人已有的权位和经济地位；霸占和滥用权力以获取物质为目的和其它本不属于个人的东西，或者使付出大大超出原有的价值；灰色腐败指介于腐败和任人唯亲之间。本文引证那些邪恶腐败的种种弊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其加以重视，并加以杜绝。

本文题为“继续与腐败作斗争”是继笔者1999年所写的《与腐败作斗争——一个援助机构、宣教组织和教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而来的。在《与腐败作斗争——一个援助机构、宣教组织和教会所面临的迫切

任务》推出以后,笔者发现该书在许多国家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而且,时至今日,该书仍在广为流传之中。该书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腐败的定义、形式与内容,腐败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圣经》是如何看待腐败的,从伦理、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个途径来反对腐败。书的重点在于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分析腐败的现象,在批判腐败的同时也呼吁社会对腐败展开具体的打击活动。

“继续与腐败作斗争”,重点在于叙述从1999年到2002年期间,教会、援助机构和宣教组织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希望的曙光:越来越多的教会以及与教会相关的机构开始加入到反腐败的事工中来,处在不同境况中的人们没有放弃以自己的力量来反腐败(如“吹哨者”、“研讨会的组织者”和“可信的帐本”等等),他们提供了许多有创意的建议,努力使自己的分析说明更加地精细;他们成立了新的反腐败同盟,比如宗教间的联络网。但是,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障碍,那些热衷于腐败的人改变了自己的手段,使自己的腐败行径更加隐秘,一些领导,教会也有这样的领导,他们甚至阻止自己的同事继续参与反腐败的斗争。

本文同时在较深程度筛选、评估了一些判断和分析:许多的教会通过反思《圣经》的教训和宣讲的方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在反腐败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故而少数的《圣经》经节串联也收入本文。教会各种各样的努力表明,领袖在与腐败这一癌症的战斗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开拓领袖的责任远见是减少腐败的关键。性别系数也是同样的道理,通过种种的研究表明,妇女的壮大也可以直接减少腐败。本文从几个角度来思考宗教团体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贡献,主要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曙光,同时又能够互相激励。

二、成功与障碍

1、成功

以上所提及的各项事实表明,教会发展机构和教会的社会宣教组织以及在社会和它们自己的机构里开展了各种反腐败的斗争。南半球的合作者相对于它们相关的教会发展机构和北半球的捐赠者来说,在反腐败上显得更加积极。有这样一个例子:在不同宗教网络——“信仰组织反腐败国际网”(INFOC)的成立大会上,许多北半球的代理机构在南半球的合作者积极地参与其中,其中有一改革宗的牧师来自韩国的新教教会,他是韩国“透视国际”的干事;另一位是世基联前任的职员,现任雅加达大学的校长。与合作组织的联系在南非、巴拉圭、菲律宾和洪都拉斯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些由南半球合作者在南半球国家中不断提升的反腐败的意识得到坚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千禧年——2000年战役的报告”中,夏洛特·梅斯基(Chalotte Mwesggye)说到:“在乌干达的我们如果不能激烈地表明我们正在反腐败,我们就难以得到减免债务的支持者的支持。说实在的,如果只有部分国家要员在减免债务中获益的话,乌干达的人民并不支持减免债务的运动。”

教会及教会相关的机构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从神学上、伦理学上和宗教对话上反思有关腐败问题的教训。教会及教会相关机构的宣讲材料和宗教教育已经在某些国家中被采用,期望我们将会得到更多国家的采用。

2、障碍

北半球的基督教发展机构已经意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有部分的机构正准备参与其中,但仍然有大多数的机构有所顾忌,因为害怕自己的赞助人会对此施以消极的反映。在本人的经验中,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个人或机构的捐助者已经知道也阅读了大量有

关腐败事件相关的材料,他们深受震撼,从而愿意花更多的钱来促使发展的代理机构和他们自己的合作伙伴进行反腐败。

社会宣教会在这段时间里做了更多的预备工作,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更直接地碰触到他们合作伙伴教会腐败非常严重的事件。

各个国际基督教协会和联盟,如世基联、路德宗世界联盟、改革宗世界联盟,各个宗教协会,如CCA,CLAI,AACC,CEC和MECC都先后成立了有关反腐败的部门,但不是都已经开展了实际的工作。全国性的教会团体所开展的事工需要国际组织在宣言上、公开化上和组织研讨会方面的支持。

现在,最大的障碍是教会中参与到反腐败中的人有时裹足不前。因为教会的领导害怕因着反腐败对自身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对其他教会领袖和教会自身的形象也会有所不利。事实上,如果能够在教会中彻底地进行反腐败,他们的可信度也就会越强。所以说,个人或教会机构支持和维护反腐败的各种活动是最重要的。

三、深化反腐败的宗教与伦理基础

1、圣经基础

腐败几乎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至少它是随着司法的出现便开始为人所知的。当人们要寻找判断腐败的伦理准则的时候,《圣经》的洞察力为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发。有少数几位有建树的神学伦理学的学者在腐败相关的问题上有所探索并且有专门的论著。

在《旧约》中,最早直接论及腐败的应该是《出埃及记》。在“十诫”之后仅三章的经文中便讲到:“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出23:8)这一段对腐败的禁令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统一王国以前的时代,而且,它不是一个偶然论及不能接受贿

赂的表述而已,而是非常明确反对贿赂的命令。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标准对于每一个法律系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在与旧约同时代的历史上,埃及和米索不达米,腐败的现象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出埃及记》中,反腐败的法律已经制订出来!接着,我们来看以下什么是严禁腐败的伦理判断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法律上保护弱者,这如同其它几处经文所提到的:“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赛5:23)与腐败作斗争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弱者和穷人,使弱者和穷人能够远离腐败势力的强权。但同时,穷人的腐败行径也是受到咒诅和批判的,“也不可在此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23:3),所以,任何人不能因为腐败是贫穷的结果而为其辩护。

《圣经》提到在列王之前的时代中,撒母耳的儿子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接受贿赂(撒上8:3)。在《列王纪》中非常清楚地提到腐败在外交和军事活动中存在着:向敌军提供贿赂,以求与敌军结盟,让敌军为其采取军事行动(王上15:19;王下16:8)。

先知们非常清楚地论及到腐败的影响:腐败夺取人命,腐败毁坏人的性命。“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结22:12)《诗篇》第15篇1节和5节同样说到:“耶和華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先知和诗人都以同样的经节论及腐败和高利贷!其影响是一样的:剥削、生命的绝望和公义的亵渎。《圣经》说得非常清楚,财富应该来自好的行为,而不在于剥削,因为,“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义。”(箴16:8)

神学上认为拒绝腐败就是正义,这在先知们的书中陈述的非常清楚。耶和華上帝是永不朽坏的,他就是真理与正义。这就是他为何不以贿赂的方式来使古列王放他的子民从被掳之地归回(人类中的某些人

就会这样干)。腐败会毁灭一个团体,谁要是使用罪恶的贿赂,他就会被犹太人看为异教徒,这样的称呼表明他将被从上帝的团契中被剪除(箴17:23),虔诚的人从不接受贿赂(诗26:10)。

《新约》中同样有论及贿赂的事件,贿赂一样被认为是有罪的。作为逾越节和复活节的连接事件,犹大接受了大祭司的贿赂(可14:10及以下部分)。罗马的精英,如本丢·彼拉多非常腐败堕落,甚至彼拉多与犹太当权派勾结杀害了耶稣。腐败杀害人,这有双重的涵义:腐败杀害了那撒勒人耶稣,同时犹大也为腐败所杀——自己吊死(太27:5)。因为在腐败中,犹大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大祭司和长老们又贿赂那几个兵丁,让他们散布谣言,说基督没有复活,而是他的尸体被人偷走了(这段经文有历史性的争议)。《使徒行传》记述了当时官场上的判断是依凭贿赂与否。官员腓力斯企图能够在保罗的身上得到钱财,从而轻判保罗(徒24:26及以下的经节)。耶稣所在的时代在罗马的统治下,腐败的恶习成风,撒该税吏长违法勒索他人的钱财,后来又如何自愿地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半归还给穷人的故事便明显地反映这一事实(路19:1-10)。属灵的腐败可能是腐败中最危险的一种形式:行邪术的西门企图藉着送钱给彼得和约翰,从而能够得到一种能力——经过他们的按手的人便能够接受圣灵的能力(徒8:8-24)。这故事中刻画了一个道德的形象,显明了上帝不可异化的能力是绝对不能通过见不得人的交易得到的。

这些深刻教训的价值是通过一系列叙述性的故事,使人归信的,与腐败作斗争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切故事所反映的成功之人的形象和社会在于没有腐败。《圣经》中没有任何一节经文为腐败的行径辩护。相反,有许多的经节清楚地分析了腐败的后果及没有腐败的社会的价值:

腐败

上帝

杀害和毁坏生命	要生命
压制穷人	要正义
阻碍经济的发展	要由诚信而来的财富
毁灭信任和信心	要团契
毁灭诚信和可信性	要真诚
强化了暴力和武力的冲突	要和平

2、其它世界宗教反腐败的宗教基础

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中,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或儒家的传统中,对腐败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清楚反对腐败的观点不仅局限于《圣经》,同时也可从其它宗教的经典和传统中找到。

犹太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反腐败上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它们主要引用的《圣经》经节来自同一个《旧约》传统。希伯来文中表达“贿赂”的几个词语(sochad,baetza,kopaer)都特别强调不正义的利益和不透明的关系。

伊斯兰教:《古兰经》明显地反对腐败。《古兰经》与《圣经》一同认为以贿赂行审判是有罪的(《古兰经》2,189;5,9)。伊斯兰的传统把礼物(hiba,hadixa)和贿赂(raswa)作了清楚的区分:“腐败出现在陆地和海上,因为那是人手所作的恶事”(30/42);“要寻找安拉为你预备的来世之家,不要忽略了与世人分享,要如同安拉一样做好事,不要寻找地上的腐败,安拉不爱那些干坏事的人”(28/78)。卡伦王(可能就是古列王)因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成为自大的、挥霍无度的、得意忘形的和故意作恶的人,这一故事说明了大量的金钱容易导致了人腐朽堕落。同样的教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经济社会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宝,却导致了腐败成风,富足的卡伦王忘记了他的主——安拉和随从自己的人。与人分享财富和做善事乃是穆斯林必须尽的职责。通过卡伦王的故事,说明真正的信徒绝对不能故意行恶。

印度教:众所周知印度存在腐败。但是,印度教的伦理却是建立在“法”(达摩,dharma)、“利”(artha),和“伽摩”(kama)这三种美德之上的。作为印度教信仰基础的著名的经卷——Kama-Sutra就是以这三种美德为开始的。“达摩”意为:好的为人、真正和诚实。放高利贷、赌博和贿赂是不诚实的敛财的手段,而且与“法”是相违背的。好的君主和好的臣民应该遵循“法”的原则。它促使君王成为有责任心的领袖,使君王毫无偏见。印度教认为贪婪是腐败的根源,克服贪婪的教训正是“Kaema-Yoga”的中心。印度教认为阻止人随从“法”原则,而获得私利的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腐败被认为是道德没落的最后可见的人类的历史——Yuga时代(黑暗的时代)。近代印度教中最著名的反腐败的斗士是马哈马·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他生活在一种极为简单的生活方式中,他也宣传他的生活方式,号召所有的官员和政治家持守谨慎和在实行公共的权力是拒绝一切私人利益的引诱。对于甘地来说,非暴力和与腐败作斗争都一样是“法”美德,是一种严谨的生活。

佛教:对于佛教来说,征服这世界上的恶乃是人类存在的目标,首要的也是最后的目标就是到达这一“极乐世界”(Nirvana)。腐败是世界上罪恶的一部分,所以,腐败和吝啬,这两者都是源自人类的贪欲,它们阻止人到达“极乐世界”。这意味着要到达“极乐世界”必须除去人一切的欲与望。“八层路”中的八种佛家美德和“五规”是建立佛教伦理的基础和定位。在佛教中,一个人的行为或称为“因”与其“果”——“得救”是紧密相关的。根据佛教,皈依的人可以有与恶的两种行为可以选择,但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完全的责任。

儒家:儒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体系。在过去、在现今它都扮演着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反对腐败,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与世界其它的任何地方一样在过去的某些时期里腐

败广泛存在,尤其是在那些文化迅速变迁的时期里,例如通过丝绸之路与罗马帝国交易的时期。在儒家中,腐败被认为是有罪的,它是诚信与团体的大敌。在儒家团体与家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东方的团体伦理避免了个人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成为滋生裙带关系的沃土。亲戚的关系在任何生活领域中扮演中心的角色,“关系”是社会的润滑剂。与上述其它大多数的宗教一样,儒家把腐败视为个人的道德问题,不管是在现代西方社会,还是政治科学领域,它都被视为政治结构和经济的巨大挑战。

3、有责任心的领袖

齐克果对腐败有一表述:“ $C=M+D-A$ ”。当某人拥有对物质或服务的独权(monopoly power),拥有自行的裁决权去决定你是否接受它,接受多少,以及失去责任心时,人们就会看到腐败。腐败大多是缺乏约束和权力责任心而造成滥用权力的结果。

即使我们不把腐败仅仅视为个人的道德行为问题,使领袖成为有责任心的领袖也是与腐败作斗争的中心战略。树立一种新的领袖观是征服腐败的首要工作。西非的教会领袖研讨会上曾经建议编写一个“领袖的文件”。根据《圣经》,使人归信的能力和权威总是通往服务和责任的。这责任是既有责任心、诚实又互相监督的权力。

以下内容将从基督教和非洲的传统价值观的角度来反思领袖的责任问题。它是肯尼亚神学家,世基联主任撒母耳·科比亚(Samuel Kobia)博士在一次反腐败会议上演讲稿的节选:

教会企图扮演着一个特定的角色就是应该关注已经成为受人批评最严重的事——领袖的道德。我的意思甚至远远超过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道德的危机在非洲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挑战,在世界也是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在非洲和世界范围内,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促使我们必须向

领袖进一言。

称为新的国际新秩序是通过全球化表现出来的，但它是全球经济的一种种族隔离。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在它成为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之前，它是一个道德问题。

教会有道德责任感的领袖应该关注债务和结构调整等领域，这些都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仅仅取消债务是不够的，随着取消债务运动的开展，教会应该提出有关借入、借出和分散等经济道德的问题。在这三个领域中教会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教会应该没有偏差地表述对结构调整政策和项目的看法，正如债务利息与债务的归还缺乏道德的，这使人们如同身处长久的苦难一样。

在反腐败中，教会领袖的道德责任感是受到批评的。正如以上所述，腐败和贪污受贿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在欧洲某些国家中，办理手续的过程的所得叫做佣金，这样的收入在其它国家中可能就被视为贪污。如此，我们不能说腐败仅仅在南半球国家中存在。然而，如果一个社会中腐败和贪污受贿成为一种惯例和普遍接受的标准行为，那么，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标准。在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被视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三腐败国家，其中的教会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国家都声称拥有基督徒的人口比例是非常大的。毫无疑问，非洲如果要拥有一种合理地 and 有效地利用及分配自身资源的机制的话，进行一次道德与伦理的巨大转变是非常必要的。我一直坚持，教会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角色不仅仅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要去参与，其实这也是由非洲人的身份所决定的。在非洲的传统中，谈论一位腐败的领导人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因为在非洲，领导人本来就应该与道德、诚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西非的基督教协会和教会联盟（FECCIWA）将率先在西非推出一个领袖伦理的指导性方针。

第二个促使西非的基督教协会和教会联盟觉得有必要向领袖的道

德发出挑战的是在公共生活中重新兴起可信与诚信的文化。西非的基督教协会和教会联盟如何致力于使非洲各国政府真正成为优良传统的政府呢？那优良的古老的传统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讲述的，它是一种持续不断地对领导人绝对诚信的要求。正如乔治·阿依提（George Ayittey）教授所提醒我们的：“传统的非洲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他引用1918年被废黜的国王曼特斯·奥伯立·塔奇（Mantse Obli Taki）为例。奥伯立·塔奇被指控犯有多项的罪名，其中最大的是：“他没有征询土地主人的意见，以加纳族人民的名义出卖土地，并且以自己的王位为抵押进行借贷。”

这儿有必要提到另一个例子，事情发生在上一个世纪，1883年，阿散特（A Sante）人民废黜了他们的国王蒙萨·本苏（Mensa Bensu），因为这位国王不断地向人民增收税收，而且没有能力管理税收所敛聚而来的。

更近一些时候，加纳的首领巴瑞马·阿杜巴·奇勒（Barima Adu-Baah Kyere）与自己的随从，因为有人要刺杀他而四散逃亡。同样我们不会忘记杰瑞·洛林斯（Jerry Rawlings）于1983年走向权力的末端被人处死是因为他发现有大量的腐败行径。

非洲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处置腐败领导人的方式，几乎所有的惩罚都是严厉的。在塞内加尔，有腐败问题的国王必须退位，而且往往在退位之前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在一次全方位的和严厉的群众审判之后，一位约巴鲁的国王被勒令进入自己的王宫的角落，自缢而死。这表明非洲土著对腐败的管制是多么的严厉。

总之，我建议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哪儿是非洲人掩埋了真理的地方，造成领导人生活在如此有尊严的生活中？哪儿是灵魂最要紧的部分，使我们的人民有能有名和在“忍无可忍”中无情地处理我们的部落——借以支撑所有人的希望？究竟是在精神的慷慨中，导致了

非洲领导人素质的特征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开始在灵性上非常慎重地作出回应,并以此作为社会的基础。

然而,我们可以在非洲各个地区找出如何处置腐败领导人的事例,少数地方,如在加纳人们是通过起义推翻严重腐败的首领和国王。我强烈提议,西非的基督教协会和教会联盟不仅仅应该担任起在这地区甚至更广的范围对腐败问题加以深刻探讨的领导责任,你们必须花巨大的尽力来完成它。我所特别强调的在于非洲价值的重生以及对于领袖伦理淡漠的各种行动和管理。所有的基督教原则和价值观为真正推动公众的伦理与正义提供坚固的基础,同时把在非洲建立一种可信任与诚信生活文化提上普世运动的议事日程。

四、腐败的性别系数

1、在有关腐败的文献中的性别系数

大多情况下陷入腐败行径中的是男性,但是在反腐败的各种活动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少。为了制订出有效的反腐败战略,研究腐败中的性别系数会有很大的作用的。以下几个有意思的问题:腐败行为与性别有关吗?性别会影响腐败吗?这在反腐败战略中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福莱·那孔兹(Regula Frey Nakonz)通过对那些与腐败相关的文学进行研究后,他在“万民食粮研究”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性别系数在腐败相关的文学中几乎没有出现。查阅那些作品后,发现对之有所提及的几乎没有,互联网上也没有太多的相关报道。苏珊·乔治(Susan George)解释说,在有关腐败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出现性别的系数,事实上“透视国际”发现几乎所有的腐败都是由男性所主导的,可能是上了年纪的男性——那一辈人对性别问题不敏感。然而,通过对柏林“透视

国际”年轻的和部分的女性职员进行调查以后,发现事实已经在改变了。但是最终没有发现一种独立的、明确的研究——它们在对问题的陈述与所用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以下就是对所提问题的研究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2、腐败与性别有关吗?

腐败与性别有关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法兰克(Frank)和苏兹(Schulze)以试验的方式来找出答案。他们最基本的研究就是先设下一个问题: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员相对于其它的人群是否更容易有腐败的倾向?在最后处理腐败与性别介入因素时,他们按性别把数据再一次排列。法兰克和苏兹在他们的实验中安排了学习经济和学习非经济专业的男生和女生,并给他们设置一个假设的问题:在假设的情况中,这些学生必须选择有利于公众的或是个人意趣的行为。研究的结果发现,学经济的学生相对于非经济专业的学生更容易倾向腐败,同时,性别影响因素却非常小。女性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相对于本专业的男生来说,腐败的倾向较小(但是,相对于非经济专业的学生来说,机率却大得多!);反之,这也说明非经济专业的女生,相对于非经济专业的男生来说,腐败的倾向较小。法兰克和苏兹指出这些说法事实在该领域中对性别不同的“先入为主”观念是矛盾的。

史瓦密(Swamy)及其他的人通过分析各种统计数据的方法来检验性别和腐败的关系。他们首先是分析和处理了“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 Survey),开展了与法兰克和苏兹相似的对男性和女性的调查。在一个假设的情况中来检验他们各自的观点:选择“有名声的”或“可尊敬的”行为还是“机会主义者”的行为。出人意外的是,最后,绝大多数的女性选择了“有名声的”方式。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接受的贿赂?”再一次证明,性别不同,那么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女性相对于男性会更加坚决地拒绝贿赂。当然其中还有许多其它的介入因素,

如年龄、身份、宗教信仰和工资收入等等。

史瓦密及其他的人接下来的一步是分析“乔治亚腐败研究”中有关世界银行的金融报告。他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按性别来分析相关的情况,并且列出那些腐败公司的名单。又一次表明,那些由男性主管和经营的公司的腐败额是那些由女性主管和经营的两倍。同样和上一个分析一样,有着许多其它的介入因素会产生影响,如公司的特点:规模、工作的调配、依赖国有模式的经营方法以及主管经营者受教育的水平。

史瓦密及其他的人所做出的以上的结论,似乎腐败行为与腐败倾向上,个人的水平与法兰克和苏兹所得出的不一样,而且这两者的分歧是无法调和的。

更进一步,史瓦密及其他的人分析处理了更大范围的问题。他们根据“腐败的存在与妇女的参与”来对比、调查不同国家中的情况。为了更好地说明事实,他们引用了“透视国际的腐败观念引得”(1998年)和1995年的“国际危机引论”这两个文献。再一次他们发现在腐败的问题上会有许多介入因素。例如,个人在国家中的教育水平、传媒的独立程度、多样化的伦理准则、社会的凝聚力、国内服务的薪酬和殖民地历史的情况。为了说明妇女的参与情况,他们引用了妇女在工作单位和议会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来说明。妇女的参与范围与腐败的程度非常地小。这一结论也是通过不断地检测、通过多种其它的方式和多种多样的问题的报告而得以确认的。

从杜勒(Dollar)以及其他人的“世界银行研究”中,人们同样可以发现妇女参与的比重与妇女卷入腐败事件成反比的关系。

史瓦密及其他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在妇女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事物的比例越大的国家中,妇女拒绝腐败的机率越高,妇女的腐败行为和腐败事件越少!”那么,提高妇女参与政治和经济事务,至少在短时期中是

一种有效地进行反腐败的措施(这一提高通常还能够缓解贫穷,以及促进性别的平等)。同样,杜勒以及其他的人也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妇女尤其能够推动一个“诚实”的政府。

津巴布韦“透视国际”的梅罗马孚鲁(S.Mehlomakhulu)使用一个名为“质量方法”来检测腐败行为中的性别不同的影响因素。她使用了妇女较少接近“权力、金钱和有影响力”——这一腐败“通货”的方法,最后发现一个事实,妇女为了获得或保住一份工作或者想得到提升,往往她们必须为自己的性别而付出代价,例如被迫接受性骚扰;另一方面,因为性别的劣势,妇女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更愿意选择以贿赂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的时期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从这一性别角度,梅罗马孚鲁认为反腐败的基本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提高妇女接近资源和获得为资源作贡献的相关权力和职位的机会。

3、性别影响腐败?

透视国际的资深顾问——罗斯琳·希斯(Roslyn Hees)列出了多种多样的性别影响腐败的事实:

1、腐败加剧了暴力和对人权的亵渎。同时,更多的妇女和儿童受到侵犯。另外,腐败的行径往往与团伙犯罪,如毒品贸易或吗啡势力缠绕在一起。这样的肉欲交易和色情泛滥的成长环境中,妇女和年轻少女将会受到最直接的影响。

2、当政治权力和政府部门可以用金钱换取或者靠个人关系获得的时候,那么妇女要得到它们就更加地困难了。同时,腐败精英分子的行为也直接压制住安全机构的话,那么,推动妇女的权力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3、假如媒体被政府、政党或私人的意趣所控制,或者媒体本身已经

腐败了,那么它们关注妇女机会也就减少了。

4、腐败的司法系统会加剧业已存在的对妇女的歧视:在有关争取妇女权益的诉讼中,男性往往会以贿赂的方式赢得官司。

5、在宏观和微观上:腐败会掩盖了妇女在提高其经济地位的种种努力。在宏观上,腐败减少了政府的收入(税收、外国的援助、私人的收入、不合理使用公共基金)。削弱政府的收入往往受到伤害最大的就是妇女和儿童:教育、医疗健康、家庭的配给和其它的社会费用,也包括基础设施(水、电)。从微观上来看,对于妇女来说,找到工作和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少。妇女企业家在工作或获得成就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利的因素。

6、如果入学、证书和文凭能够用金钱换取的话,那么妇女的不利因素会更多,而且她们往往会被迫以性服务的方式进行贿赂。

7、随着腐败而来的违法的污染和环境的毁坏会冲击穷人,尤其是妇女与儿童受到的影响最大。

希斯含蓄地指出腐败的性别系数的不同问题。她指出,一方面与梅罗马孚鲁相近,特定的性别问题,尤其归咎于“腐败”,是对妇女地位压制的结果(薪酬、学校系统、法律纠纷、获得成就等等),她主要的兴趣在于性别对资源的流失或国家法规被侵犯时这些“大腐败”的影响。在希斯的论文中她没有指出具体任何一种资源,这仍然给我们留下含糊的东西,我们难以把她的经验归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或者是一种“普遍意识”的声明。如果是“普遍意识”的声明(有许多其它的论证支持这一点),那么她所提出的能够成为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基础,并且值得广为推行。

4、总的评价

许多的事例表明,妇女相对于男性来说普遍地会拒绝腐败的行为

和较少地倾向于采取腐败的行径。原因至今难以说清楚,有许多种假说,如社会学的:较少接近腐败的群落、较少接近“腐败的通货”、较为不懂得施行腐败的行径。甚至,通过不同国家的对比发现:妇女较多地参与公众生活与腐败率低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努力推动妇女参与包括公众生活至少在短时期内能够成为一种反腐败有效的战略。

腐败有着性别的结构,然而,经过多种方式的倾向研究发现,一方面,由于妇女较少接近“腐败资源”,所以妇女的“好强”有限,这就是为何妇女在腐败系统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的原因所在。被迫到一定的程度,她们就会以“性本钱”的不恰当的处理方法以求得到“平衡”。但是,这实在不能与她们的人类的尊严相比;另一方面,种种不利的社会因素,造成妇女比男人更依赖于以腐败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结论来自大多与“小腐败”和对那些以性别来反腐败感兴趣的人和企图以提高妇女的地位,使她们接近资源的方法来反腐败。但同时,“大腐败”也会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这种腐败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流失,尤其是对妇女造成许多的不利,并且会造成政府秩序的混乱,这样妇女会遭受最大的不利。

所有这些,如同笔者在其它地方所提及的,所有的这些研究也与企业伦理模式相呼应:提高妇女的权益就将意味着重视伦理。

五、结论

教会、其它宗教团体、发展机构和宣教网络的种种经验和参与过程显示出一个事实: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正在与腐败作斗争。制订战略,鼓励个人和有信仰基础的团体作出分析资料使事件明朗化的种种努力……这一切都是希望之光。

同时,还有更多的事工需要开展,世界各宗教团体在实际生活中通

过自己宗教的经典对腐败进行反思,并且对腐败的行径说“不”仍然没有得到坚固以及更明确的阐释。有的为了复兴而把掩盖贿赂视为必要;许多的人仍然保持沉默,或害怕政治压力,或恐惧经济制裁;有更多的人是保持半心半意态度,他们既不沾染贿赂也不反对腐败。

继续与腐败作斗争比起解决一些经济问题更加重要。它是复兴的根本所在,只有当腐败灭绝了的时候,才有可能致力于或挽救团体、个人和机构的道德,并且提高它们的可信任度,才能谈及人类的发展、保护上帝的创造、促进和平和男女平等。让我们与腐败斗争到底,并且一起种下更远大之希望的种子。

(译者系本院教师)

(责任编辑:黎新农, 责任校对:邱小珍)